

## 日本:章开沅先生史学研究的关键词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解读

○田 彤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章开沅教授所从事的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包括张謇与商会)、近代化比较、教会大学史、日本侵华史等研究,无一不与“日本”相关。“日本”在其学术话语中有日本学人、日本论域、人文关怀与外交关系交互平台的涵义。借助“日本”这一关键词,他在跨文化交流中,以“世界主义”、理性爱国主义,回应着来自民族主义与文化科学的挑战,完成了学术文化与民族主义的两重超越。

〔关键词〕日本;文化科学;理性爱国主义

由于中日两国间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特殊的关系,“日本”作为中国学者的思想载体,充当太多的角色,已经作为一种符码植入中国学者的知识谱系之中,甚至成为一种分析工具,内化为一个思想维度,契入中国学者的思维。纵观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理路,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包括张謇与商会)、近代化比较、教会大学史、日本侵华史等研究,无一不与“日本”相关。“日本”在章开沅教授的学术话语中有其独特的语义。

### 一、“日本”涵义之一:日本学人

章开沅先生是改革开放后率先登上海外学术论坛的大陆学者,以诚为本,广结“学缘”,其学养得到海外学者的推崇。

章开沅先生以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史研究步入史门,并因此而结缘日本学界。1963年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引起海外学者瞩目。1975年出版《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为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列为该校文学部

研究生教材。197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与日中友协奈良县本部名誉会长、日本中国研究所北山康夫教授先后慕名来访,就辛亥革命史研究交换意见,并邀请章先生访日。

1979年 11月,章开沅先生受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联合邀请,由美赴日,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者第一次踏上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章先生此行结交一批日本历史学者,特别与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市古宙三、野泽丰、“四条汉子”(中村义、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石田米子,及京都地区辛亥革命研究者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狭间直树、清水稔,结成终生不渝的深挚友谊。

学者之间,尤其是跨文化交际的学者之间,学术观点难免分歧、对立,但这无碍于有着相同的学术精神与宽厚胸襟的史学家共建互信的学术关系以至私谊。在有关辛亥革命革命性质的核心问题上,除野泽丰、菊池贵晴支持章开沅先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外;市古宙三呼应一些欧美学者所持的“绅士运动”说;石田米子、小岛淑男与狭间直树等,坚持工农群众乃是辛亥革命的主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交锋并非“华山论剑”,无需一争高下,只要不断提出新史料、新思路,论证其原有命题,都能得到真正学者的相互尊重。坚执自己的学术观点,本身即是史家“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砥砺,更有助于深化学者对既有学理的思考。章先生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中,通过增进相互间理解,为日本关东、关西学界共同尊为学术知己。

章先生通过学术出访,扩宽视野,反思辛亥革命史研究现状,1980年在《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号著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甫经发表即为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研究月报》全文译载。章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3卷本,1980—1981年陆续出版后,一度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研讨主题。

1981年 10月,章先生参加国内“纪念辛亥革命 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与陈锡祺、李宗一、金冲及等随胡绳前往日本,出席“东京纪念辛亥革命 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提交《“排满”与民族运动》论文。期间,还应邀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的小型讨论会。此次访日与竹内实、岛田虔次等几位资深学者交换学术心得。在章先生的导引下,中日学术交往日益频繁。始自 1981年,上述日本学者大都来过武昌参加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1985年日本佛教大学清水稔副教授来华师进修,随后章先生将其弟子赵军派往日本佛教大学、东京大学访学。1993年 6月,章先生完成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圣地亚哥校区)三所著名大学 3年讲学与研究后,应邀赴日本讲学与研究 3个月,在海外近 4年,虽然研究重心已转向中国教会大学史,但始终未能忘情于辛亥革命史,先后在日本和台湾发表《排满平议——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再认识》、《大陆地区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多篇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重要论文。

此后,章先生为实现“努力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

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的使命,多次穿梭日本。1993年6月,章先生应日本福冈县与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等单位联合邀请访日,提交论文《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并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演讲《关于孙中山研究之思考》,赴东京国际文化会馆讲演《史学寻找自己》,与井上清、森时彦、清水稔、久保田文次、中村义、小岛淑男、藤井升三、狭间直树、田中正俊、滨下武志交换学术心得。

2005年10月,在日华人学术组织中日学术交流中心与华人教授会主办“中国同盟会建立100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华人教授会所组织的第3次大型研讨会,并得到国际交流基金、中国大使馆、日本华侨华人总会等机构支持。中国驻日大使王毅专程致辞。章先生不避耄耋华年,前往千叶商科大学出席会议,与庆应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山田辰雄分别作《中国同盟会:百年后的观察》与《另一个中国革命》的基调讲演。

通过张謇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为纽带,章先生结识一批日本学者。除上述人物外,尚有近藤邦康、河田悌一、森时彦、石川禎浩、明治大学高田幸男、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中井英基。章开沅先生不仅得到日本学者的尊重,而且还得到年高德劭的日本学人鼎力相助。

日本北海学园大学藤冈喜久男教授是年长章先生5岁的挚友。由于对张謇研究的共同的学术兴趣,两人在1987年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见如故。章开沅先生早期资产阶级研究由张謇入手,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即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藤冈先生的《张謇与辛亥革命》(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社1985年版),曾引用过该文。会间,藤冈教授喜获章开沅先生所赠《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感触颇多,多次与章先生晤谈。尽管两者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藤冈教授为书中所引用的《张謇未刊函电》、《来函汇集》、《近代史料信札》等大量非一般日本学人轻易寻觅与索解的原始文献所折服,要求代为译为日文出版。藤冈教授回国后,一年多来与章先生书信交驰,深究某些艰深诗文的翻译细节,力求译文准确、雅驯。在藤冈的努力下,《张謇传稿》日文版于1989年由东京东方书店出版。

章开沅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人物文化转型论题时,出版《离异与回归》一书,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离异—回归”范式,藤冈教授颇为激赏,又主动承担该书的日译工作。

比章先生年长4岁的野泽丰先生,被章先生视为兄长,日本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任职京都大学人文学院,1986年退休后转任骏河台大学,创建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曾任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出版《孙文:革命尚未成功》(诚文堂新光社1962年版)、《孙文与中国革命》(岩波书店1966年版)、《辛亥革命》(岩波书店1972年版)、《亚洲的变革》上、下卷(校仓书房1978年、1980年版)等专著及《辛亥革命的阶级构成——四川暴动与商绅阶级》、《辛亥革命与日本: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亚洲第一次共和革命的冲击》、《张謇与南通》、《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日本文献中的张謇与南通》等专题论文；为扩大学术交流，自费创办《近邻》杂志。曾参加中日友好运动、中国学术代表团欢迎活动。他曾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捐赠大批书籍，长期惠寄《近邻》。1997年，为弥补友人曾参与侵华战争的遗憾，野泽丰先生捐资 300 万日元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设立“野泽丰奖学金”，并不顾年长体弱，4 次莅汉为学生颁奖。其高尚人格必将在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久保田文次教授，则是章先生的忘年至交。久保田先生 1937 年出生，东京教育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日本女子大学，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见长，用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将辛亥革命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加以比对研究。久保田教授作为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核心人物，自 1960 年代该会创建以来，与会中灵魂人物野泽丰教授及会中“四条汉子”共撑会务，30 多年来，以其任教的日本女子大学校为活动场所，以自己的研究室为联络处。该会曾举办 1991 年、2001 年两次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年轻学者提供学术交互平台，将一批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推上学术前台，出版《辛亥革命研究》杂志。久保田教授牺牲公休，自费帮助章先生抄登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献。可以告慰久保田先生的是，其所提供的资料已纳入“清史工程”《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于 2008 年出版。

日本专攻中国辛亥革命史、甚至中国史且各领先机者皆与章先生建立良好的学术关系。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成为章先生史学研究对话的重要一极。

老一带史学家的风义已演化为中日师生情谊。河田悌一，关西大学校长，岛田虔次大弟子之一，在中国思想史方面颇有建树，1980 年代来华中师范大学访学，即与章先生结下深厚学谊，自称“章开沅先生的学生”。2006 年 8 月河田教授授予章先生荣誉博士学位，2007 年 10 月，邀请章先生与余英时等国际一流学者出席该校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启动庆典。2008 年 10 月，河田校长登上华中师范大学“博雅讲堂”，发表《李大钊与“时间论”》的演讲。在章先生与河田教授努力下，华中师范大学已与关西大学结为姊妹学校，互派交换生。

## 二、“日本”涵义之二：日本论域

作为论域的“日本”，随时空推移，在章开沅先生的记忆与思想中有多重面相。

章先生在情感层面与日本的接触，始于童稚时期。其家族曾经营当涂马鞍山铁矿，所产矿石有部分销往日本八幡制铁所。先生幼时随父亲驻矿，时常得到来矿上运输矿石的八幡制铁所经办人员的罐头、糖果。日军侵华后，少年的章先生竟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于自责，甚至有一种负罪感，认为自己家族出口的铁矿变成了日军的枪炮，友人的居所变为侵略者的温床。战争中的颠沛流离、躲避日机扫射、家族四散的悲惨经历，萌生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厌恶与义愤。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掩盖日军侵华罪行，右翼势力污蔑南京大屠杀是中美两国编造的谎言。章先生愤激于日本右翼言论，

参与并推动维护追求历史真相的活动。1988年初夏,章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出席中国民主运动史国际研讨会之后,利用学术休假,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初步检索中国 13所教会大学档案全宗,在业师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个人专档中,意外发现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1991年得到耶鲁大学历史系邀请并获鲁斯基金资助,专程前往神学院图书馆,历时 8个月,潜心系统阅读 130多盒、千余卷的贝氏全宗,复制 1000余页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1998年 5月再次前往该图书馆,全面搜索有关“南屠”藏档。贝德士,牛津大学历史学硕士,1920年由基督教联合布道会派往中国,在金陵大学教授世界通史、俄国史等必修课;曾帮助青年章先生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图书借阅证。抗战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贝德士奉校当局之命由日本返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南京沦陷前后,与 20余友人共创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管理南京安全区内 20余万难民,并与同仁将日军暴行逐日记录下来,照会日军以示抗议。1946年 7月,贝德士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法庭,提供大量证据,无可辩驳地坐实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贝德士是该会最后一任主席,1950年回国后将委员会所有档案带到美国。

1995年抗战胜利 50周年,章先生编译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并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编《南京:1937. 11—1938. 5》图片集。1997年南京大屠杀 60周年,在中央决定通过纪念活动反击日本右翼颠覆史实的大环境下,该书重新得到热评。中外媒体纷纷采访章先生,新华社所发专题通讯被 100多个国家的媒体引用与转载。当年,章先生还参加南京、日本召开的纪念会,报告论文《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耶鲁神学院藏档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献评述》,发表题为《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主旨演讲。

章先生通过贝德士文献发掘日军屠城史实,日本右翼因此诬陷贝氏系“反复无常的伪证制造者”。章先生随即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 2期发表《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经多方考证,指出贝氏等外籍人士确是当年日军暴行的见证者,而制造伪证者恰是当年日本军方控制的新闻机构与现今掩盖日军罪行的右翼势力。

章先生在系统整理、翻译 1300多件贝氏文献后,又在其他 10位当时也在南京工作过的美籍人士的档案中发现大量材料,1999年 9月出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资料集,全面展现贝氏档案与耶鲁大学收藏的有关“南屠”文献。与《拉贝日记》相比,贝氏文献因系原件而非之后整理而更具权威性;同时全面印证、丰富《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1938年汉口出版)的史实。该书英文版由美国 M. E. Sharpe, Inc. 2001年出版。2003年,章先生出版《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全面回顾自己 15年来揭露日军暴行的经历。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此给予报道。学术的谨严性,保证对日本右翼的攻击的有效性。2006年 9月,在首届南京国际和平论坛开幕式上,

因研究南京大屠杀成绩卓著,章先生与其它 7 位中日人士被授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章。

国民政府西迁,日军从 1938 年 2 月至 1943 年 8 月空袭重庆长达 5 年,繁华市区皆为瓦砾,人员死者逾万。日军轰炸重庆是继德国 1937 年 4 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后又一惨绝人寰的战略轰炸,拟动摇中国政府与军民的抗战斗志。章先生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与受害者,呼吁组织人力,整合资源,要像研究南京大屠杀一样,加强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

文字工作外,章先生还参加系列实际活动,表达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心声。

1990 年底作为发起人参加海外华人自发组织“对日索赔会”,讨论筹备纪念南京大屠杀会议。1991 年底出席在纽约举办“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演讲贝德士功绩。1998 年 6 月,参加亚太和平与公正联合会在纽约举办的“日本证人访美代表团”报告会。此外,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正义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谬论。1997 年底出席纪念南京大屠杀 60 周年东京国际会议,报告《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1999 年底参加东京“战争犯罪和战后赔偿问题国际市民研讨会”。2000 年在日本关西巡回演讲。甚至在寒冷的夜晚走上街头,参加提灯游行会。

章先生对年青学者的有关研究也倾力扶持,曾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前认真审读,并提出中肯意见。正是在章先生的关心下,长期研究日本浪人与大亚洲主义的赵军,推出《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将右翼置于日本社会与民众之中,多角度多侧面地勾勒出从头山满、黑龙会一直到二战后“传统右翼”与新右翼的宗谱与特征,指出正是日本社会的畸形现代化孕育出传统右翼,而二战后社会民主改革的不彻底及美国政府的庇护纵容,右翼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成为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错误决策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工具。<sup>[1]</sup>

章先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正如他在接见日本友人渡边信夫时所说:通过发掘战争的根源,明确战争责任,以杜绝相似的战争再次爆发。缘此,日本学人与有关人士愿意与章先生结成反战同盟。

年长章先生 4 岁的田中正俊教授,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作为历史学家与忏悔老兵(曾作为学生兵在菲律宾、台北等地驻扎),他将日本战争责任归结于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并认为部分历史学者屈从文部省“修订”教科书,是对日本人民、亚洲各国人民的犯罪行为。曾将《战争·科学·人》、《战中战后》赠送章先生。与田中同龄的藤原彰,系一桥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战争被害者支援会”代表委员。年青时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往中国战场。他在为天皇“效力”的同时,也看到“圣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楚与“圣战”的虚伪。战后入读东京大学文化部史学科,从此走上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史学研究之路。晚年整理自己在中国战场的体验,出版《中国战线从军记》。他多次与章先生在有关演讲会上共同作基调和报告。

小岛淑男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同仁,以史学家特有的独立品格维护史实。他为抗议文部省教科书问题而收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加藤实先生早年毕业于东京外交大学,主修汉语,曾在华任教有年,组织友人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9年翻译出版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2003年以来历时两年多时间将章先生的《天理难容》译为日文,并自费购买1500本送给日本友人,让更多日本人了解那场战争。2005年与其他9位优秀外国专家一同荣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钟奖”。

渡边信夫,1943年京都大学哲学科毕业后应征加入海军,未直接参加侵华战争,但仍背负“强烈的民族负罪感”,而后致力于基督教和平运动。2008年,85岁的渡边信夫先生亲赴华中师范大学发表“中日友好关系新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思考”的演讲,反省日军、日本民众、日本基督教会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伤害,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歉意。

小学校长松冈环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惊诧于日本的罪行,回国后又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参观该馆,并发起组织“南京铭心会”,提醒日本民众真诚反省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该会成员多为幼稚园教师、保育员、家庭妇女、邮局职员等,其活动逐渐由大阪扩大到关西地区。她不畏右翼分子的威胁,总是走在和平游行队伍最前面。2002年8月,松冈环女士率代表团30人来汉专访章先生。

诚如章先生所言:正是有众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丝毫没有孤寂之感,总觉得世界各国的友人都在与我一起战斗!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早期资产阶级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日本学者较早注意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从政体、土地与资本、学术思想、知识体系等方面,揭示日本近代化的动力与模式,强调日本是近代化的楷模的同时,也指出现代化不是西方所独有发展道路。章先生注重将中国早期现代化与西欧与日本早期现代化比较,以探寻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他还善于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早期现代化动力与进程,讨论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特别以日本发展为参照,提出“离异—回归”的分析模式,以此全面解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史实,希望建构现实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意识,更好地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其学生罗福惠教授的《国情、民性与近代化》、赵军《折断的杠杆》,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历史为参照,分别从文化与政治革新角度比较中日间的异同。

章先生在从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张謇的研究中,极为注意与涩泽荣一等日本企业家加以比对,探讨中日近代化的内在机制及其不同发展道路。涩泽荣一(1840—1931),号青渊,日本近代产业之父,世界公认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其“道德经济合一说”曾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业界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彻底改变日本民众对商人与实业界的总体认识。他创办、培育500

余家公司企业、600余项社会事业,发展出由金融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日本式的现代化道路。涩泽纪念财团是弘扬涩泽荣一“道德经济合一主义”的财团法人,下辖涩泽史料馆、实业史情报中心与研究部。近年来,它也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曾于东京、上海、南通举办涩泽荣一与张謇比较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因研究旨趣趋同,章先生与涩泽财团磋商,于2006年5月在华中师范大学设立涩泽荣一研究中心。当年9月、11月,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理事长涩泽雅英先生及小松淳悦常务理事一行先后来汉参加双边工作会议,更加密切了华中师范大学与涩泽荣一财团的双边关系。涩泽雅英来汉期间,还作为特约嘉宾在湖北省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涩泽荣一与中国”的演讲。涩泽财团还极力促成华中师范大学涩泽荣一研究中心与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学研究中心及两校合作研究与互换学生计划,并全额资助华中师范大学学生赴日访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 三、“日本”涵义之三:人文关怀的交互平台

章先生通过与日本友人的交往,成功搭建谋求建立中日关系新局面与探讨普世价值的交流平台。

池田大作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桂冠诗人、摄影家、社会活动家、国际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者,现任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池田先生以生命尊严哲学为根本,为了世界和平及文化教育交流,遍访世界各地,先后与汤因比、佩西、鲍林、诺曼卡曾斯、戈尔巴乔夫、常书鸿、金庸等几十位各国政要、企业家、文化、宗教与学术界名流对话,广泛深入地探讨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哲学、宗教学、政治学、艺术、经济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养与见解体现在《人间革命》、《新·人间革命》、《展望二十一世纪》(与汤因比的对话集)、《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与贝恰的对话集)、《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与金庸对话集)、《敦煌的光彩》(与常书鸿的对话集)、《社会变迁下的宗教角色》(与B·威尔逊的对话集)、《第三虹桥》(与罗古诺夫的对话集)、《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与戈尔巴乔夫对话)、《人生问答》(与松下幸之助对话)、《世界市民的展望》、《畅谈世界哲学》(与钱德拉对话)、《和平世纪的倡言》等书中。

章先生在金陵大学就读时便修读王绳祖先生讲授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自1985年阅读《展望二十一纪》后,即敬佩池田先生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步入21世纪后,回首池田先生与汤因比教授的对话,有感于上述两者的对话中关注的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未能解决、甚至有些问题如局部战争、环境污染、社会混乱、道德沦丧、腐败等更趋严重,提出“21世纪的人类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的命题,呼吁有识之士共商自救之道,自觉肩负历史学家的人类关怀的使命。

2005年6月,马敏教授出访创价大学,与池田大作先生晤谈,提议池田先生与章先生开展对话,池田先生欣然首肯。同月,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池田大作研究所,以探究池田先生思想精髓,深化民间交往。随后创价大学与池田先生的私人代表高桥强教授也来华中师范大学商讨学术交流有关事宜。为打造对日交往的民间平台,章开沅先生2005年12月中旬应邀出访创价大学,接受创价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与池田先生一见如故,彼此神交已久的两位智者就中日友好及人类终极关怀等议题开始首次对话,开启对谈的帷幕。翌日,12月14日,日本《圣教新闻》报即以“日中新时代的对话开始”的通栏标题,报道此次对话。

2006年10月14—15日,适逢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议题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时,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与创价大学联合举办“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市委宣传部车延高部长,与来自日本、台湾、大陆等国家与地区20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专家百余人出席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池田先生和平观、和谐观、教育观、文化观、人性观等议题展开讨论。章先生发表《殊途而同归——我与池田先生的相遇与相知》的演讲,道出两位长者正视中日关系史、携手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的心声。《圣教新闻》19日、20日、21日连续报道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教育报》、《长江日报》、湖北卫视教育台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恰是温家宝访日“融冰之旅”之时,3月28日至4月26日间,章先生应邀出席创价大学开学典礼,并再次与池田先生晤谈。其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两者以通信方式穿越时空对话,互相交换思想。日本《第三文明》杂志2008年全年连载章先生与池田先生的对话。

章先生虽然与池田先生国籍不同,但彼此间的经历与思想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心灵相通。两者均在战争中成长,经战祸苦难;少年辍学,在社会底层从事卑微劳动,同情劳苦大众;二战后期服过兵役,但却没有打仗;爱好文学,崇敬鲁迅;敬仰孙中山、周恩来;尊敬、喜欢汤因比。两位长者都是倾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教育家,都有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良师。池田先生的导师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圣先生因反对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战争而屈死狱中。先师们为世界和平与社会正义奋斗的精神,成为池田与章先生的人生航标。

池田先生1975年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等议题展开对话,首开其“对话”的思想之旅,对话录以26种语言出版;30年后再与历史学家章先生对谈,感慨万端。池田与汤因比对话的根基在于两者均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相信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泉源”。池田与章先生对话的根基之一,则在于两者对历史学的共同体任。池田将历史学视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他欣赏章先生“优秀历史学科万古长青”<sup>[2]</sup>的论断,强调:“只有借鉴历史,人类的未来才会和平、胜利。光明的轨道才会延伸。在此意义上,没有比了解历史更强大的武器。”否则,社会将退化为“无轨道”野兽般的生活方式。“无论经济有多么发展,名气多么大,如果不学习历史,这种繁荣是短暂无

常的。当今是正确历史观无比重要的时代。”坚信正确的历史观是构筑人类和平的基础；指出“当今 21 世纪世界前途未知，已逐渐进入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此境遇中，历史观和哲学显得尤为重要”，“正确而深刻的历史观是对未来人类最好的馈赠”。<sup>[3]</sup>

正是双方的相互理解，其对话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民族差异，而以“民族地球村”村民的宏阔视野，呼吁世界和平、文化共生、人与人的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科技与人文并重，强调教育是根本、青年是联结昨天与明天的希望，以此严防社会出现那种经济增长而无社会发展进步的“悖论”式趋势。

尤为需要指出的是：（1）两位思想家相信在“经济一体化”前提下，人类社会将日益共处“地球村”中，将出现一些“趋同性”的发展，但反对某些国家与民族强势干涉别国内政，通过霸权主义实现所谓“世界一体化”，强调各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实现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时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赞扬发展中国家通过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成绩。（2）两位智者对竭泽而渔式的非“绿”色产业发展的检讨，超越西方民粹派的乡村社会主义理论、生态学派、替代技术论等反现代化思潮，明辨西方发达国家藉“低碳”经济限制、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动机，以科学态度对待环境保护问题，试图寻找一种较为合理的机制，适度调节现代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同时反对发达国家将污染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的“国策”。（3）他们关注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尤为主张教育平等，以此作为实现经济、政治平等的前提与基础。（4）两位乐观主义者希望中日两国弘扬并向世界推展各自文化中的谦忍、包容的文化精髓，以此引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 四、跨文化交际的关键词

真正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不断变换思考问题的视角，找到新的思考坐标，善于宏观思考，提出独到且犀利的观点，就在于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视域与文化背景，了解并理解众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同时，必要的教育背景、学养、多专业方向研究的涵化、亲历历史与海外生活的体验，诸种因素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一套个性鲜明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历史观。章先生就是具有这样秉赋的历史学家，在跨文化交流中回应着来自民族主义与文化科学的挑战。

人类文明原本因文化多元而异彩纷呈，然而，由于各种认识偏差，“本民族中心主义”、“本国中心论”充斥学术界，甚至成为一些学者处理国家外交关系的准绳。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表面讨论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间的差异，实则以“基督教文明中心主义”，提请美国政府严防中国因发展而可能带来的威胁，从而保障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文明的冲突》的“咨政”性削减其学术性。如果说亨廷顿注重文化差异，章先生则重视文化的共性与共生。他尊重不同文化，理解各文化间的差异，重视各文明（包括国家）发展的趋同性，以“世界主义者”的宽容立场，思考学术的生命力与人类的命运；主张“首先应该

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宏扬而又超越,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sup>[4]</sup>

在学术研究上,章先生的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与现代化研究,之所以能大气磅礴、成一家之言,就在于其宏大的视野与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均得益于与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众多海外学者的对话与自我“涵化”。

章先生更关注人类的集体命运,恒言:“身为历史学家,我认为历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关注人类如何实行自我改革,如何促进自我改善……历史学家必须通过揭示历史教训,引起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历史学家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切实教育和启发人类,告诉他们为了避免过去的悲剧重演,人类必须克服自己的贪欲、愤懑和愚昧。”因此,西方霸权主义、环境污染、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正义迷失都是他所聚焦的问题。他强调“国家之间,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共存,不仅以共同的利益为目标,更应该看到别国的优点,并努力学习他们的优点。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才能建立持久的和谐共存关系。”认为“求同存异”正是和谐共存最为理想的状态。实现“求同存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相互对话,谋求沟通。

即使从事南京大屠杀研究,章先生同样能跳出民族主义的迷障,努力探寻日本侵略的内在缘由,以警醒世人,消除可能导致历史悲剧重演的各种因素。他强调,追忆充满恐怖的历史,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宣扬正义,吸取历史教训,促进中、日和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他宣传理性爱国主义,主张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尊重日本民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反对盲目排拒日货及媒体过分渲染中日磨擦的非理性行为。同时,他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2005年12月10日,在东京召开的“纪念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演讲中,章先生重申:“我们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超越历史。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日关系始终是以友好为主流。我们这一衣带水的两个邻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唇亡齿寒。保持正常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日两国的幸福,亚洲的幸福,全世界的幸福。”<sup>[5]</sup>2006年8月,章先生在接受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后,发表题为“张謇与日本”的演讲中,论述张謇的日本观,向日本青年宣传中国人的“理性爱国主义”。2007年4月下旬,在为北海学园商科大学学生所作“中日关系展望”报告中,同样给日本学生一个中日友好发展的未来景象。

明晰战争责任是为了避免战争重演,而非以此让日本青年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章先生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旨趣与国外以追求社会进步、正义为主旨的所谓“创伤史学”或“伦理史学”何其相似。“创伤史学”代表、德国史学家吕森,强调要以“反思性地探求有关的决定性原则和规律”<sup>[6]</sup>的态度,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尤为可贵的是,章先生还特别强调,中国学者在体会中国人的战争痛苦的同时也要体会日本民众的痛苦,通过彼此交流增进理解,共同寻求美好的未来。当然,这一切都源于他热爱日本秀丽山川与淳朴、勤奋、尚礼的百姓。正是如此,学者田中正俊、藤原彰等学者,与老兵东史郎、加藤实、日本基督教和平

运动者渡边信夫、松冈环等一些日本民间反战人士,超越本民族立场,本着人类之良知,倾力支持章先生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检讨。

由此不难体悟,章先生的“世界主义”的内涵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其“世界主义”内涵包括以下几种:(1)尊重学术的差异性;(2)承认各民族、国家文化的平等、人权与生存权的平等;(3)从全球化视角关注人类社会的病症,寻找解决之道;(4)超越宗教朴素的“救赎”意识,追索理性的人文关怀。

“理性爱国主义”则是章先生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交汇的产物与结合点。“世界主义”常常是西方强势国家干涉、甚至吞并不发达国家的理论工具,一些中国学者不明国际学术发展前沿,不明“世界主义”宗旨,贸然以此自炫,拟提高自身学术视野与学术认同的同时,往往销解自身对某些西方国家的警惕。在西方语境下,民族主义基本等同于原教旨主义,是学术主流反感的语辞。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它是中国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实现政治正义、社会正义、道德正义的工具;同时又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放大器。历史误解、贸易壁垒、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历史障碍,均因此而成“死结”。“理性爱国主义”有助于化解与调适上述两种价值取向,体现章先生本着世界主义原则、恪守民族主义立场以处理学术文化与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亦是章先生的史学伦理观,更是章先生所希望的中国公民应具有的大国国民的风范。

章先生曾谦逊地说过,自己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其实远非如此。吕森有言:“跨文化交流应当完成两项任务:一方面,它应将历史思考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通过批判和反思使全球化进程参与历史思考,将历史思考转化为该进程的一种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同时还应当将历史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任务清楚无误地表达出来:即让作为历史固有特性的众多的独特之处出现在该进程中。”<sup>[7]</sup>其话语恰当地诠释了章先生的思考与追求。

正是由于跨中日文化交流,章先生完成了学术文化与民族主义的两重超越。“日本”折射出章先生博大的史学家的情怀。

#### 注释:

[1]赵军:《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章开沅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2][3]《只有实事求是的真诚对话,才是推动历史的强大力量——池田大作先生与章开沅教授的首次对话》,《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1期。

[4]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5]详见赵军:《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6][7][德]约翰·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蔡甲福、来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1、6页。

〔责任编辑:公乙〕